

# “无异化的技术”:可能抑或不可能

尚东涛

(洛阳师范学院政法系,河南 洛阳 471022)

**摘要:** 指向技术异化的不同取向的技术批判,在某种意义上是以“无异化的技术”为相同诉求的不同形式。但是,由于技术生成中生成着“限定”自然(物)的“禀赋”与不合自然(物)“本质力量”的内在悖论性规定,使技术内在着经由“谋算”自然(物)中介的“限定”人的规定性;由于为弥补因人的“理性不及”而导致的技术的必然缺陷,生成着将人构成于技术的必然性;由于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属人中介之技术的辩证运动,必然“扬弃两极”,“表现为主体”,使人的意志与行为的自由浸透着技术的“限定”;由于技术社会运用中的社会分工必然导致人的“活动固定化”,群体利益冲突性与社会形态历史性必然导致技术运用的社会效应合理性的非普遍性与非永恒性,使技术的社会效应形态展示着对人的现实的普遍的永恒的“限定”等,因而“无异化的技术”不具可能性。因此,我们不宜追求“无异化的技术”,只宜“接纳”异化的技术,遵从以异化技术克服技术异化的必然规律,确立合民族现代化诉求方向的技术批判意识。

**关键词:** 技术异化;技术批判;“无异化的技术”

**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5680(2004)01 - 0066 - 05

## 一 论题缘起

尽管对技术的哲学关注,不应是因为技术开始或者已经威胁到人,而是为了永恒。但是,技术批判的“潮起”,却切切实实因于技术异化威胁到人,或者说因于技术异化妨碍了人的“人是目的”或“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终极旨归。对此,技术批判的人本主义取向展示得最为显著。生态主义的技术批判,虽然突出强调了技术异化对自然的破坏与威胁,但并未也无法仅仅强调技术异化对纯粹自然的破坏和威胁,而是立足特定的自然观,将人与自然作为一个“生态整体”来看待。如果说后者在深层面上,关注的是因技术异化给人造成的“生态危机”,“技术化”的自然环境妨碍或严重妨碍到人的自然生命的维持,那么前者则直截了当地强调了因技术异化给人造成的“生存危机”,人的社会性存在的意义与根基被技术异化所“抽取”。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将有差异的技术批判所共同指向的技术异化,理解为技术对人的疏离、对立是合乎逻辑的。或者说,技术异化指技术对人的“限定”或经由遭“谋算”之自然对人的“限定”。

技术批判的不同取向,在指向技术异化这一点上是同一

的,但对技术的态度却是有别的。远自启蒙时期,近至当代,技术批判的许多思想家们因对技术态度的差异而展示的各自独特的视角,大致可以区分为两大基本倾向。其一,弃绝异化的技术,回归自然。“人类为了主宰物理世界而发明了科学技术,然而,这些科学技术却实际上反转过来说反对人”,“因此,人们对那种原始的、尚未破裂的、直接的存在之渴求就一再涌现出来。当越来越多的生命领域为技术所征服时,‘返回大自然’的呼声也就越来越强烈了”<sup>[1]</sup>。这一倾向可溯至被启蒙学派强烈反对的卢梭,虽然卢梭认为启蒙学派误解了他。<sup>[2]</sup>其二,克服技术的异化,归复人性。在E·舒尔曼的视域中,与“实证论者”相对立的“超越论者”,尽管与“实证论者”一样,未能为技术指出“有意义的未来”,但大多数“超越论者”主张赋予技术一种“自律”的力量,崭露着“超越论者”的以“自律”力量克服技术异化的一种期望。技术批判的生态主义“阵营”中的许多思想家主张经由不同的途径,克服技术异化。比如E·F·舒马赫说:“如果技术所塑造的而且继续塑造的世界呈现病态,那么明智的做法也许是检查一下技术本身。如果感到技术变得越来越非人性,我们不妨考虑是否有可能找到更好的技术——一种人性的技术。”<sup>[3]</sup>这种“人

【基金项目】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03EZX006)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 2003 - 10 - 07

【作者简介】 尚东涛(1949 - ),男,河南汝州人,洛阳师范学院政法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科学技术哲学。

性的技术”在舒马赫看来就是“中间技术”。而同属生态主义者的挪威哲学家 A·内斯则认为,只有打破现有的社会机制和人的行为模式,才能真正解决技术异化造成的危机,发展对人与环境有益的技术。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主张,以制度框架合理化克服技术异化,认为如果社会制度框架的合理化得到恢复,作为“目的理性活动”的技术理性就“不能取代”制度框架的合理化,技术“才能成为解放的潜力”<sup>[4]</sup>。马克思的技术批判指向的是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主张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替代,是克服技术异化的根本。在某种意义上,内斯、哈贝马斯、马克思的主张有相似的地方,即以社会的“改变”来克服技术异化。尽管这些思想家在克服技术异化的途径之见解上各有独到,但都与主张弃绝异化的技术、回归自然的思想家们不同,认为异化的技术是能够复归人性,“还给人自己”的。

“弃绝异化的技术,回归自然”的技术批判倾向,在彻底的意义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说“劳动创造了人”,而劳动是技术的,没有技术就没有劳动,也就没有人的生成。彻底的“弃绝异化的技术,回归自然”,意味着人的“返祖”与“社会返祖”<sup>[5]</sup>。但这并不是这些思想家们技术批判的初衷,在这个意义上,“伏尔泰式”的理解并不适宜,因为“回归自然”的诉求,并不是希望使“人渴慕四脚爬行”<sup>[6]</sup>。“回归自然”的本真,在于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但如同人成为人赖于技术一样,人与自然的和谐同样依赖于技术,只不过这种技术是能够使人与自然和谐的技术。如果说异化的技术妨碍人与自然的和谐,那么人与自然和谐的技术则是“无异化的技术”。“克服技术的异化,复归人性”的技术批判倾向,追求“无异化的技术”的立场几乎是自明的。因为,技术的人性复归,既标志着技术对人的“限定”的消除,又标志着技术经由自然中介的对人的“限定”的消除,即技术对人与自然的双向“复归”。而异化的技术根本不具这种可能性,具有可能性的只是“人性化的技术”或称为“无异化的技术”。

建立在前述分析的逻辑基础上,对技术态度不同的技术批判,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无异化的技术”相同诉求的不同形式,都指向“无异化的技术”,或者说无不以“无异化的技术”为前提设定或归宿。

但问题是,“无异化的技术”可能吗?

## 二 三重分析

### 1. “无异化的技术”之不可能性的技术生成维分析

依海德格尔的看法,“正确的工具性的技术规定还没有向我们表明技术的本质”。但是,技术在自己的生成阶段,仅仅具有“工具性”的本质,是作为人的“善的目的”现实化的“推论的中项”即“手段”,被人“创造”或实现着自己的生成。在“一切手段首先就应当是目的”的意义上,作为“手段”的技术在生成阶段转化为人的“现实目的”。作为人的“现实目的”的技术生成,“扬弃目的的前提,也就是要扬弃客体的直接性”,“也就是目的的主观性的扬弃。从肯定方面说,这又是目的的现实化,即客观的有与目的的联合”<sup>[7]</sup>,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sup>[8]</sup>,是人的本质力量的首要对象化。

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首要对象化的技术生成,使人将自己的本质力量或目的“转入它的主观性的对方”,即在自然(物)的“规律”或称为自然(物)的“本质力量”的“肯定”中肯定自身,或者说是人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在与自然(物)的“本质力量”的“综合”中“保持自己”。在这里,一方面,自然(物)的“本质力量”只有经由人的本质力量的“肯定”,才能与人的本质力量相“综合”。另一方面,人的本质力量只有在自然(物)的“本质力量”的“肯定”中才具现实化的可能。不过,后种“肯定”如同前种“肯定”一样,亦是经由人的本质力量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sup>[9]</sup>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异化的技术”在技术生成维获得着不可能性。

首先,技术生成中,生成着“限定”自然(物)的“禀赋”与不合自然(物)“本质力量”的内在“悖论性”规定,使“无异化的技术”不具可能性。

在技术生成中,人的本质力量所指向的“最终目的”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sup>[8]</sup>。被作为“现实目的”的技术,只是技术生成中的直接目的,人的“最终目的”不是技术或技术的生成,而是以指向自然(物)为基的人的生成。只不过人的“最终目的”,只有在技术生成这一“现实目的”中才具达成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技术生成中首先生成着,指向或“限定”、“强求”甚至“奴役”自然(物)以满足人的生成的“禀赋”。对此,一切生成之技术概莫能外,不论人给予具体的技术以何种价值命名,比如“征服”自然的技术或“协调”人与自然的技术等等。因为技术生成的惟一目的,只是为了把自然(物)“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只不过或“恶”或“善”或“善”“恶”程度有异而已。

但是,技术生成中,人的本质力量的天然的“理性不及”,在对自然(物)“本质力量”的“肯定”或“把握”或“知识化”或“技术化”的过程中,只能或“误”将所“肯定”的自然(物)的“本质力量”,强行规定为自然(物)的“本质力量”。或者说自然(物)向人“显现”的“本质力量”,并不与自身相同而被人当作同一。人实际上只是从自然(物)的“本质力量”中抽取某种“片段”,并将这种“片段”赋予“整体”的意义而“技术化”。这就使技术在生成中,生成着不合自然(物)“本质力量”的规定性,从而赋予自身以指向自然(物)“禀赋”与不合自然(物)“本质力量”的内在悖论,生成着自然(物)“报复”人的规定性,生成着经由自然(物)中介的“限定”人的规定性。事实上,技术在指向自然(物)过程中,必然引起的作为整体的自然(物)对人的“报复”或“潜报复”或“报复集聚”,在某种意义上,早就植根于技术的生成中。“无异化的技术”在技术生成中就不具可能性。

其次,在技术生成中,生成着将人构成于技术的必然性,使“无异化的技术”不具可能性。

在技术的生成中,人总是保持有,使生成的技术成为“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而自己“超脱其自身于它们之外”,占有自由的期望<sup>[10]</sup>。如果说“自由虽然是一个内在的观念,它所用的手段却是外在的”,那么人“超脱其自身与它们之外”获得自由的期望的实现,以生成的技术对人的“现

实目的'的现实化的全面性为根据。

但是,一方面,人的“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诚如前述,由于人的“理性不及”,人不可能在生成的技术中全面“肯定”作为整体的自然(物)的“本质力量”,从而使生成的技术生成着非全面性或生成着必然的缺陷。另一方面,技术生成中人所运用的“先在技术”或“前技术”<sup>[11]</sup>作为已“物化的知识”,蕴含着“理性不及”,是技术生成中人“不能自由选择”的必然限制,从而使生成的技术生成着非全面性或生成着必然的缺陷。这就表明,由于人的“理性不及”,生成的技术使人“超脱其自身于它们之外”而占有自由的期望失去了现实根据。相反,人的这种期望在技术的现实生成中,走向自己的反面,逻辑地历史地转换为“舍弃自身于它们之内”的选择。即人在技术生成中,将自身纳入生成之技术的构成,成为生成之技术的要素,生成技术,以弥补生成之技术相对于人的“现实目的”而言的必然缺陷。否则,生成的技术无法具有指向自然(物),使之“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的内在“禀赋”。这就进一步表明,在生成的技术中,人不可能指望“超脱自身于它们之外”而占有自由,却必然为生成的技术所“限定”与“强求”。这是技术生成的铁的逻辑。

如果,我们将石器时代技术之生成,作为人类技术生成开始的标志,或者说作为远古人类技术生成的一个标志,那么生成之技术在人类史上一经出现就生成着“限定”人的必然性。比如,当作为具体的技术是“砍砸器”技术时,这类石器技术内在地具有“限定”与“强求”人练就强有力的臂力的必然性,否则其就不具技术的可能性而不是技术。比如,当作为具体的技术是中石器时代的弓箭技术时,其必然“限定”人既要拥有强有力的臂力,同时要拥有瞄准力,否则弓箭技术就不是技术。及至后来,现代技术生成中,人同样将人纳入生成的技术,成为技术之构成。时至今日,生成之技术对人“限定”之必然性没有改变的丝毫可能性。事实上,“不管人作为个人是否知道,是否愿意,自身贯彻的”都是“人是技术人员”之规定性<sup>[12]</sup>。这不仅是现代技术,而且是古代技术,同时是未来技术,或者说是一切技术生成中对人的必然“限定”。当我们以迄今的人类技术生成史之两极为例,继续前面的分析时,生成着的技术将人构成于技术的必然性的逻辑与历史获得着同一。

如果作以归纳,那么技术生成中,生成着对人的直接限定的规定性。“无异化的技术”,在技术生成维不具可能性。

## 2.“无异化的技术”之不可能性的技术辩证运动维分析

假定“无异化的技术”,在技术生成维具有可能性。但是,当生成的技术真正成为技术,即构成现实的技术运动,其“无异化性”必然会发生根本的“相变”。且不说假定只是假定。

实现生成的技术,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作为真正技术的“开始”。当技术作为“一种事情在其开始时,尚没有实现,但也并不是单纯的无,而是已经包含它的有或存在了。开始本身也是变易,不过‘开始’还包含有向前进展之意。”<sup>[13]</sup>使技术“从仅仅是可能的使用价值变成现实的和起作用的使用

价值”,“执行与它们的概念和职务相适合的职能”<sup>[10]</sup>,即由“名词”变为“动词”,构成现实的技术运动,技术才成为真正的技术。

技术成为真正的技术,在传统理解域,即技术成为人与自然(物)之间的属人中介。在人与自然(物)的关系中,人尽管自己赋予自己以主体的规定性,但作为主体的人并非是自足的。相反,只有赖于自然(物)才能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sup>[8]</sup>这里的“不断交往”,即人与自然(物)的“相互作用”。换句话说,人只有在与自然(物)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中才能生活。但是,“仅仅‘相互作用’=空洞无物,需要有中介。”<sup>[8]</sup>技术或“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或中介。因为只有经由技术“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如果说人的“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sup>[8]</sup>,或者说人与自然(物)的关系史之所以成为真正的历史,惟在技术作为人与自然(物)关系的属人中介的语境中,才具可理解性。换句话说,作为属人中介的技术运动,使自然界成为人本学的自然界,实现着自然向人的生成。这似乎表明,技术作为属人中介的性质的“本质性”。或者说,技术在技术运动中决定于人,人“限定”着技术或技术运动。

但是,在辩证法的视域内,当技术在“最高次方”上成为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中介或构成现实的技术运动时,作为中介的技术总是表现为“完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它把两个对立面综合在一起,并且,归根到底,这个中项总是表现为片面的较高次方的东西同两极相对立;因为最初在两极间起中介作用的运动和关系,按照辩证法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即这种运动或关系表现为自身的中介,表现为主体,两极只是这个主体的要素,它扬弃这两极的独立的前提,以便通过这两极的扬弃本身把自己确立为惟一独立的东西。”<sup>[15]</sup>事实上,在技术中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诚然能够决定,他愿意采取这个或那个技术行动”,不过,“这个或那个东西借以显示以至于它们才表现为技术上值得愿意的或值得追求的方式方法,决不能靠人的意志制造出来”,人“不支配这种行动的可能性的条件”,相反,“人总是不能逃脱”作为中介的技术的“统治”<sup>[12]</sup>,人总是被“限定”于作为人与自然关系之现实中介的技术或技术运动。

在一般意义上,不论如何理解,人归根到底追求的是“自己决定自己的”自由,即马克思所言的“人的自由发展”<sup>[16]</sup>。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的技术或技术运动对人的“限定”,在本质上是指向人的自由的。技术中介对人的自由的“限定”,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展示为一种“复合性”,即技术中介既可由遭人“谋算”的自然(物)间接“限定”人的自由,又可赋予这种“限定”以直接性。由于篇幅的原因,这里只对技术中介对人的直接“限定”作以分析。

当我们人的自由理解为,主要包括意志自由和行为自由时,人与自然关系中技术中介对人的“限定”,至少可从两方面把握。一方面,由于“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那种能力”,因而人的意志自由浸透着技术

的“限定”。因为,人对自然(物)的认识,即自然(物)呈现出来的现象、规律等,是自然(物)在人与自然(物)的技术关系中所呈现出来的,即海德格尔所言的“技术展现”。其实这种“展现”不仅仅是“新时代技术”的“本质”,而且是人类技术的普遍性“本质”。比如,远古时代,“猎物”之所以成为人的“猎物”,并不是这些动物的自身规定,而是“狩猎技术”对这些动物的“限定”,这些动物只是在“狩猎技术”的视域内才呈现出“猎物的本质。人对“猎物”的认识、对“狩猎目标”的设计和行为的选择的“意志自由”,无不“限定”于“狩猎技术”。意志自由是技术的。另一方面,由于人在与自然(物)关系中的行为自由,突出表现为对自然(物)的“支配”(对自然或物的“征服”、“保护”、“恢复”、“协调”等等都是“支配”),因而人的行为自由同样浸透着技术的“限定”。因为,“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支配”,而后者如果说是“实践力量的人”的话,这种“实践力量的人”只是“技术人”的另一种称谓。人“支配”自然(物)的行为自由的前提,惟在于人“支配”于技术。否则,对自然(物)的“支配”根本就不可能。如果说,“人化自然”的生成,标志着人对自然(物)“支配”的行为自由的实现,首先在于人被“技术化”,成为现实的“技术人”或有“实践力量的人”,即成为或工人或农民或渔夫或工程师等等,被纳入一定的技术构成之中。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在技术中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的存在只是技术存在的一种方式,人是技术,人的一切行为自由都在技术中介的“限定”中。

只要技术现实的成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成为“动词”的技术,构成技术的辩证运动,技术中介的属人性便发生“相变”,必然现实的“限定”着人,而不是相反。“无异化的技术”,在技术辩证运动维不具可能性。

### 3.“无异化的技术”之不可能性的技术社会运用效应维分析

如果假定,“无异化的技术”在技术生成维与辩证运动维均具可能性,那么,要确证“无异化的技术”之不可能性,就只能寄希望于技术的社会运用的效应域。因为,这一“双重假定”,既排除了生成之技术的指向自然(物)的“禀赋”与不合自然(物)“本质力量”的悖论性规定,又排除了作为人与自然关系之中介的技术运动对人的“复合性”“限定”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正如有的思想家所坚持的,技术异化与否惟在于技术的社会运用是否具有合理性。

首先,社会分工导致的人的“社会活动的固定化”的现实性表明,在社会效应形态上“无异化的技术”不具可能性。

人的社会分工,具有社会现实性。这种现实的人的社会分工,必然导致人的“社会活动的固定化”,因而,在人的自由发展的尺度上不具合理性。不具现实合理性的社会分工,在本质上是技术社会运用的基本方式。作为技术社会运用基本方式的社会分工,使人成为被特定技术“限定”的人。尽管这种被“限定”,有“自发”与“自愿”之分。但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区分只是表明,不同的人在接受技术“限定”时的不同的心理倾向或内在感受性。不论是“自愿”的还是“自发”的,在现实性上总是人被“限定”于技术,而不是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中曾设想,“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以实现“每

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的社会技术运用方式,打破因社会分工导致的“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即使在某种意义上表明,“单调”的分工界限的“模糊”,也并不表明分工的现实取消,只不过表明“分工变易”的可能性。况且,即使社会能够提供这种可能,以人的现实能力的“非至上性”,这种可能性的领域仅具非常的有限性。“分工变易”仍是分工,只不过人被“变易”的技术所“限定”,只不过人被“限定”在“变易”了的“固定化的活动”领域而已。且不说,在当代分工愈细的现实与趋势中,还根本体悟不到“分工变易”普遍性的现实可能性。因此,由于分工这一技术社会运用的基本方式,相对于人的自由发展的不合理性,使人只能“屈从于分工”<sup>[16]</sup>,屈从于技术的现实“限定”。在技术的社会运用效应形态意义上,“无异化的技术”不具可能性。

其次,社会群体利益的差异性或冲突性表明,社会效应形态上的“无异化的技术”不具可能性。

技术的社会运用,是具体主体的技术运用。如果说,技术运用的主体可以有个体与群体之分,那么由于个体只是群体的个体形式,技术运用的基本主体可以理解为是群体。群体之所以是群体,惟因利益之差异或冲突。群体间存在共同利益,但这只是群体特殊利益的一种形式。群体间的利益在根本上是有差异或冲突的。如果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那么,不存在一般的技术的社会运用,技术的一切社会运用,都是一定的群体为着自己的利益的社会运用。“利他”的技术社会运用,同样包含着“利己”的内核。技术社会运用的群体利己规定性,在历史与现实,突出展示在群体间的经济、政治、军事等的对立与冲突中。如果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军事或战争是政治的继续,那么当以战争双方对技术的运用为极端之例时,就充分表明,利益对立或冲突的不同群体的技术运用,无不是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为直接目的或终极目的。如果说“商场如战场”,那么利益冲突的商家之间的技术运用,同样是以自己获得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至于经济活动中的“双赢”之说,不属于利益冲突群体的范畴,而是利益共同体或暂时的利益共同体内部的情形。因此,在利益冲突群体间,双方的技术运用,都是以对对方的“限定”、“强求”为目的或前提,技术社会运用的普遍合理性不具可能性。如果说,运用技术的社会群体的利益差异性或冲突性具有普遍性,那么,技术的社会效应展示的则是,对人的普遍性“限定”。在技术的社会效应形态上,普遍意义的“无异化的技术”不具可能性。

再次,社会形态的历史性表明,社会效应形态上的“无异化的技术”不具可能性。

在历史主义的尺度内,技术的社会运用,是构成历史的不同社会形态的具体的社会运用。不同社会形态的历史替代性,既表明每一社会形态的历史合理性,又表明其历史的不合理性,或者说每一社会形态的合理性不具纯粹性或包含着不合理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每一社会形态在生成之初,就内在着被替代性。换句话说,一定社会形态完成了对前一社会形态的替代,也就开始展开着自己被替代的运动。这就

同时表明,一定社会形态的技术运用的合理性不具纯粹性或包含着不合理性,或者说一定社会形态的技术运用在社会效应形态上的“无异化性”是不可能的。技术的社会效应形态在历史变动中,具有永恒性的不是别的,而是对人的“限定”。马克思充分肯定着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同时强烈抨击其不合理性,批判其对工人的“限定”、“强求”与“奴役”,指出其被替代的必然性。在某种意义上,任何社会形态的技术运用的纯粹合理性或永恒合理性都是不可能的,否则社会形态的历史替代就不可理解。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如果发展的社会归结向生产力,生产力归结向技术的社会运用,那么被替代的社会形态的被替代性的根由,则在于该社会形态从形成就开始的技术运用的不合理性及其积累。当技术在社会效应上对人的“限定”或异化性的积累,达到了不能或无法调整的程度,该社会形态便占有了被替代的根本性规定。

以前述逻辑为基础,社会效应形态上的“无异化的技术”不具可能性。

### 三 结语

如果前述分析不无道理,那么“无异化的技术”不具可能性。“无异化的技术”不可能性之确证的可能启示,也许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理解。其一,在对待异化技术或技术异化的态度取向上,人不宜追求“无异化的技术”,只宜“接纳”异化的技术。因为,如果人只有在技术中,才能实现与持续自然向人的生成或人的生成;如果“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无异化的技术”不是人可能“解决的任务”或达到的目标,人能够达到的目标只是异化的技术。那么,人就宜或只宜在情感、理性、实践层面全面地“接纳”异化的技术或技术的异化。其二,在技术异化扬弃或克服的取向上,人宜遵从以异化技术克服技术异化的必然律。“接纳”异化的技术或技术的异化,是为了扬弃技术异化。但技术异化只有以异化的技术来扬弃。因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sup>[8]</sup>“无异化的技术”对技术异化或异化技术的替代,不具任何可能性。以新的异化技术扬弃先前的技术异化,是会带来新的技术异化,但这却是克服技术异化的惟一途径,是人的持续生成或发展的根本性支撑。在这个意义上,人的历史命运或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命运,系于新技术的生成与运用,尽管其展示为异化的形式。其三,在技术批判的取向上,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人宜确立合中华民族现代化诉求方向的技术批判意识。我们当然应当对现代

技术异化保持清醒的警惕性,但我们更应当对民族现代化与西方的巨大差距,对民族的现代技术水平与民族的现代化诉求的巨大差距,特别是对克服这类差距的可能选择,有更加清醒的认识。如果,当难合中华民族现代化诉求方向的技术批判意识片面膨胀,成为民族的现代技术发展的可能的观念障碍时,就有悖于技术批判对民族生存和发展以及人类繁荣的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之本应旨归。

### 【参 考 文 献】

- [1]恩斯特·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65.
- [2]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166-167.
- [3]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84.
- [4]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76.
- [5]尚东涛.论社会选择与自然选择之张力[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4).
- [6]参阅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23.
- [7]黑格尔.逻辑学(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432.
- [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85,52,52,85,74.
-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19.
-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03,207-208.
- [11]尚东涛.技术间性论[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4).
- [12]转引自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79,65-68.
- [13]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97.
- [14]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172-173.
-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3.
-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73,56.

(责任编辑 殷杰)